

## 钩沉

## 子弹飞翔

●王天德 秦富梁

“一颗饱浸抗日英雄陈年旧血且锈迹斑斑的‘子弹’，由开国中将刘飞所携，从江南水乡呼啸而来，在历史的天空划出炫目弹道后，已然蝶化为脍炙人口的红色传奇。”军旅作家高建国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因生动再现抗战传奇引起广泛关注。

有评论说，作品是对“江南抗日义勇军”(下文简称“江抗”)历史缺乏认知或了解又疑信参半者的强烈补钙，是对“战争历程和文化精神的双重书写”。健在的“江抗”老战士、新四军历史研究工作者和“江抗”后代，对这部作品也十分认可，认为该书问世填补了全面翔实再现“江抗”历史及英雄群体的文学空白。

## 被忽略的历史隐秘角

1985年百万大裁军后，高建国一走入驻豫原第二十集团军，便立刻发现了这支部队与其他部队的迥然不同处。部队历史与红色经典《东进序曲》《黄桥决战》《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密切相关。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现代戏《芦荡火种》《沙家浜》取材于该部36个伤病员阳澄湖斗争经历。

1948年11月，刘飞在运河河畔的窑湾古镇指挥歼灭国民党第六十三军，淮海战役首战告捷。时任新华社战地记者的崔左夫赶来采访，刘飞对他提出了采写36个伤病员坚守阳澄湖芦苇荡斗争事迹的设想。9年后，崔左夫赴苏南写出的这篇特写，为原二十集团军文工团团长陈荣兰意外所得，于是成为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创作的蓝本。

历史隐秘角，以“江抗”为代表的新四军部队所具有的鲜明文化特质，令高建国不禁怦然心动。原来英勇善战的革命武装，不都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啊！能打仗、有文化，这或许是我军若干部旅本质但却长期被忽略甚至遭曲解的一个重要特征。

## 诗词鉴赏

## 长相思

●(清)纳兰性德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赏析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皇帝御驾出巡，准备出山海关回奉天祭拜祖先。纳兰性德作为扈从陪伴左右，在一个风雪之夜，写成这首词。词作语言朴实，真切自然，抒发了远行人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古代因为通讯不便，在外的旅人思念家乡，情感无以排解，往往发而成诗成词，有着动人的力量。这首词便是如此。你看，路途迢迢，跋山涉

水，一程又一程，向着榆关(即山海关)外行进。虽然是陪同皇帝出行，但旅途同样艰辛。夜晚驻营，千顶帐篷，千盏明灯，星列于野外。壮丽则壮丽矣，但千盏明灯下或许有着千颗无眠的心。

上片叙述兼描写，下片则以描写和抒情为主。荒寒的塞外，天气恶劣。卷地的狂风、铺天的暴雪，交相吹刮，整宿不停，击打着帐篷，惊醒了梦中的人们，击碎了他们的思乡之梦。连在梦中回归故乡都已不成，无以寄托，只能在辗转反侧中遥想此时的北京故园。那等待旅人归来的家园，一定没有这样狂暴的声响；那昏黄的灯笼，夜中的静穆，该是多么温馨和亲切啊。(雨果/文)

## “世界最美的书”评选——

## 《园冶注释》获银奖

## 《茶典》获荣誉奖

●曹玲娟



2018“世界最美的书”评委会就《园冶注释》给出如下评语：本书是明代计成所著，是一本现代版本的古书，却洋溢着古风古韵。排版遵照传统，版面布局节奏则富于变化，给现代读者带来丰富的阅读体验。卷首页颇为内敛，内文隔断选用的纸张手感富于变化。全书采用单色印刷，图文搭配和谐，气质恰到好处。细节处理非常到位。

2018“世界最美的书”评委会就《园冶注释》(张静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是我国著名林学家、造园学家陈植为明代造园学家计成所著《园冶》做的注释。《园冶》于1634年写成，为中国最早、最系统的造园著作，同时也被誉为世界造园学最早的名著。

2017“中国最美的书”评委会就《园冶注释》给出如下评语：本书是明代计成所著，是一本现代版本的古书，却洋溢着古风古韵。排版遵照传统，版面布局节奏则富于变化，给现代读者带来丰富的阅读体验。卷首页颇为内敛，内文隔断选用的纸张手感富于变化。全书采用单色印刷，图文搭配和谐，气质恰到好处。细节处理非常到位。

《茶典》(潘焰荣设计，商务印书馆出版)则以钦定《四库全书》中的八部茶学著作作为蓝本，精选中国历代“茶”主题珍品书画九件作为插图，全面讲述刻画的中国的茶文化。两位获奖设计师运用现代设计语言，恰到好处地将园林和茶这两种中国文化的典型元素呈现在世界面前。

关于《茶典》，2017“中国最美的书”评委会的评语如下：本书的内容选用钦定《四库全书》茶书8种，采用现代设计语言阐释古老的茶典。体例间隔纸张选用宣纸，很朴素；隔页配图，与内容相匹配；封面材料、色彩选用都很到位。“世界最美的书”组委会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共收到来自全球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评作品600余件。国际评委经过3天的精挑细选，最终评选出14部作品荣膺2018“世界最美的书”称号。由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主办的“世界最美的书”评选已有近百年历史，代表了当今世界书籍艺术设计最高荣誉，评委会来自德国、英国、瑞士、荷兰、罗马尼亚等国的著名书籍艺术家、学者组成。

术甄别求证。

在上海，高建国来到“最后的护理员”、当年曾在阳澄湖后方医院护理过刘飞的卫生员、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白山家，看到了许多摄于战地的照片，为作品写入了几个感人细节。

60年前，新华社记者崔左夫为写《血染着的姓名》专程采访过时任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的施光华。时隔一个甲子，高建国再访年届九十七岁的施光华，印证了当年陈毅确定“江抗”番号的珍贵历史细节。此后，遇有涉及“江抗”的存疑史实，则请他把关。有史料载，太仓县长郭曦晨是抗战烈士。施光华提出，全国解放后他在上海见过郭曦晨。后查明，郭被捕后，经组织营救去广州工作了。

“真实是写实类作品的生命，报告文学的力量在于真实。只有坚持文学性、思想性和文献性统一，才能为时代留下一部信史。”本着对历史负责和以信史告慰前辈的精神，高建国把求真作为创作前提。他自信，全书所有细节皆有所本，无一杜撰。

寻找《沙家浜》中沙四龙的人物原型胡小龙，是该书创作的一段佳话。高建国确信，1939年秋，在日伪企图把新四军伤病员困死湖中的危急时刻，如果不是胡小龙在敌人眼皮底下悄悄下湖解救推出小船，在水下用芦苇管呼吸托船驶进芦苇荡救出伤病员，东路抗日斗争就要改写。

创作中，他通过有关部门查到现居上海奉贤区的胡小龙，籍贯、年龄与抗战中从阳澄湖东来茶馆赴上海的胡小龙吻合，经上海新四军“沙家浜部队”历史研究会与上海市公安局联系，终于找到了湮没民间半个多世纪的草根抗日英雄，得知其祖父、中共常熟县委地下交通站东来茶馆老板、共产党员胡广兴带胡小龙到上海谋生，后因病去世。而胡小龙则低调传世不为人知。

那一天，高建国紧紧握着胡小龙的手，由衷说道：“真诚地感谢您和叔父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在新四军伤病员最困难的时候，为护佑东路地区抗日火种作出的贡献！”

“江抗”副总指挥乔信明之子，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乔晓阳，怀着激动的心情给高建国打来电话，对作品为“江抗”传神写照所取得的成就表示充分肯定，对他以顽强的毅力和精湛的文字，生动准确描述抗战时期内忧外患交织和变幻莫测复杂形势及危亡岁月的各色人等，表示钦佩，并代表“江抗”后人表示感谢。

## 真实方能求信史

70多年的战争岁月渐行渐远，历史深处兼覆苍苍。访谈中，询问创作中的困难是什么？作者沉思后回答，再现“江抗”战争传奇，一是缺少鲜活的血肉，二是莫衷一是的说法令人难辨真伪。

为了最大限度逼近历史真实，高建国调动了30年间自己全部生活和思想工具，运用了从原始到现代各种方法和工具。2015年，他利用节假日数次到江南查看重要战地遗址，寻访健在的老“江抗”，定向补充材料。在田野行走、实地踏勘和直访当事人、知情者的同时，他还运用现代信息技

## “厚积”才能“薄发”？

●郝铭鉴

急于查“厚积薄发”这条成语，是因为遇到了一场争论。一位语文老师作文课上对学生说：“你们要多读书，多观察。古人说过，厚积才能薄发。没有足够的积累，是写不出好文章的。”这位老师的话，我们完全能够理解，而且十分赞同。分歧的焦点在于：“厚积才能薄发”对吗？有人说这是成语的误用，也有人说这是成语的活用，一时争执不下。这场争论的发生，我看和工具书中“厚积薄发”缺位是直接有关的。

“厚积薄发”语出苏轼的《稼说·送张琥》。张就是苏轼的好朋友，在张琥即将赴京城时，苏轼写下了这篇杂文式的文字，用种庄稼打比方，谈做学问的道理。文章最后一句是：“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这十个字的临别赠言，概括了苏轼的人生经验，饱含着朋友间的真诚情义，可谓言简意赅，语重心长，耐人寻味。

苏轼在十个字中，对朋友提出了四点告诫，前两点关系到学习态度，后两点关系到治学态度。在学习方面，“博观”是指视野开阔，广采博览，求知若渴，爱书如命；“约取”是指眼光独到，目标明确，沉着

人生有苦有乐，就像一条大河，从涓涓细流而来，最终汇入大海。有时候遇到辽阔的平原，一泻千里，波澜壮阔；有时候会遇到幽暗的峡谷，曲折惊险，惊涛拍岸。无论如何，这条河流总是奔流向前，永不停歇。

在遥远的古代，那些可爱的诗人，他们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苦与乐？

我们今天就来讲讲杜甫和刘禹锡的房子，讲讲他们的诗歌。

杜甫是一个活得很辛苦的人，虽然他极为欣赏李白，但和诗仙李白比起来，他既没有年少成名的豪迈，也没有一掷千金的潇洒。为了扣开通往仕宦生涯的大门，他屡忍辱辱地来往于长安权贵的宴席之间。经过十余年的等待，他仅仅获得了卑微的官职。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的国运急转直下，由此陷入漫长的黑暗。杜甫流落南方，带领全家人过着极为艰苦的漂泊生活。上元元年(761)，杜甫及其家人进入四川，第二年的春天，寄居成都的杜甫求亲友告，在浣花溪边盖起了一座简陋茅屋，勉强有了一个栖身之所。然而到了八月，大风破屋，继而大雨滂沱，让全家泡在雨水中。杜甫彻夜不眠，思绪万千，于是在浓浓的悲凉中提笔写下了震撼后人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罾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仗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qīn)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首先要深入研究中华文化，不断探究中华文化精神。

研究中华文化，就要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和发展的过程性。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域板块、各民族群体都为中华文化发展增添了不同的文化要素，共同铸就了中华文化的辉煌。比如，少数民族的大量文学作品，就给整个中华文化增添了不少光彩。以史诗为例，中原文化由于受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影响，史诗和神话传说得不到完整记载，散落成为“碎金”状态，以致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史诗”。但是，如果把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计算进来，中国就是史诗的富国和强国。《格萨尔王传》是藏族史诗，有六十万行以上；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也有十几万、二十万行。南方和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神话史诗、民族起源史、民族迁徙史，数量达几百种之多。因此，研究中华文化、探究中华文化精神，要从整体上考察中华文化。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也要善于从整体上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

中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既呈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品格，也有自大封闭导致落后的遗憾，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并汲取经验教训。汉唐时代，中国具有一流的综合国力和文化实力，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唐朝大规模汲取外来音乐，“南海舶”“西域舶”和日本“遣唐使”的船队络绎不绝。这种开放带来的繁荣，使得中国人以汉为名，叫做“汉人”；唐人为字，叫做“唐人街”。然而，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北京进贡自鸣钟、世界地图时，《明史·神宗本纪》中只记一句话：“(万历二十八年二月)大西洋利玛窦进方物。”万历皇帝只把自鸣钟看作洋玩意儿，把世界地图绣成壁画来欣赏。当时的统治者只知道享受西方文明却不思吸收借鉴西方文明，导致潜在的取法西方发展科技和工业的契机悄无声息地滑走了。到了18世纪，尽管清朝乾隆时期《四库全书》以乾嘉考据学的功力展示了中国数千年博大精深的学术文化史，但可惜当时的体制不能使科学研究与创造发明相结合，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依然浪掷于以入股求利禄之中，无法开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历史一再证明：开放包容则兴，自大封闭则衰。中华文化的发展不仅来自对本民族文化的充分自信，更是注重与世界其他优秀文化交流互鉴的结果。正是在近代付出惨痛代价后，中国人的精神在压抑中爆发、在挫折中提升，终于迎来中华文化的新发展，也迎来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历史启示我们，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需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作为学者，我们研究中华文化、探究中华文化精神，切不可坐在书斋里，而要植根大地、连通地气。精致的瓷碟只能培育出绿豆芽，广阔的大地才能生长出参天大树。学术研究也是如此。为此，有必要提倡“五学法门”，即眼学、耳学、手学、脚学、心学。所谓“脚学”，就是要坚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注重田野调查，以双脚丈量写在大地上的中华文化血脉。就算研究中国传统文学，我们也要用好“脚学”，通过田野调查形成“文学地理学”。这种方接地气，可以形成文学与地理关系上的“七巧板效应”。通过田野调查，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的少数民族史诗属于草原史诗、高原史诗、山地史诗，因而不同于古希腊的海洋城邦史诗、印度的热带雨林史诗。当然，注重田野调查并不是说可以忽视深厚精深的材料文献，研究中华文化需要以丰富的文献材料为支撑。

作为学者，我们研究中华文化、探究中华文化精神，切不可坐在书斋里，而要植根大地、连通地气。精致的瓷碟只能培育出绿豆芽，广阔的大地才能生长出参天大树。学术研究也是如此。为此，有必要提倡“五学法门”，即眼学、耳学、手学、脚学、心学。所谓“脚学”，就是要坚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注重田野调查，以双脚丈量写在大地上的中华文化血脉。就算研究中国传统文学，我们也要用好“脚学”，通过田野调查形成“文学地理学”。这种方接地气，可以形成文学与地理关系上的“七巧板效应”。通过田野调查，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的少数民族史诗属于草原史诗、高原史诗、山地史诗，因而不同于古希腊的海洋城邦史诗、印度的热带雨林史诗。当然，注重田野调查并不是说可以忽视深厚精深的材料文献，研究中华文化需要以丰富的文献材料为支撑。

作为学者，我们研究中华文化、探究中华文化精神，切不可坐在书斋里，而要植根大地、连通地气。精致的瓷碟只能培育出绿豆芽，广阔的大地才能生长出参天大树。学术研究也是如此。为此，有必要提倡“五学法门”，即眼学、耳学、手学、脚学、心学。所谓“脚学”，就是要坚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注重田野调查，以双脚丈量写在大地上的中华文化血脉。就算研究中国传统文学，我们也要用好“脚学”，通过田野调查形成“文学地理学”。这种方接地气，可以形成文学与地理关系上的“七巧板效应”。通过田野调查，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的少数民族史诗属于草原史诗、高原史诗、山地史诗，因而不同于古希腊的海洋城邦史诗、印度的热带雨林史诗。当然，注重田野调查并不是说可以忽视深厚精深的材料文献，研究中华文化需要以丰富的文献材料为支撑。

作为学者，我们研究中华文化、探究中华文化精神，切不可坐在书斋里，而要植根大地、连通地气。精致的瓷碟只能培育出绿豆芽，广阔的大地才能生长出参天大树。学术研究也是如此。为此，有必要提倡“五学法门”，即眼学、耳学、手学、脚学、心学。所谓“脚学”，就是要坚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注重田野调查，以双脚丈量写在大地上的中华文化血脉。就算研究中国传统文学，我们也要用好“脚学”，通过田野调查形成“文学地理学”。这种方接地气，可以形成文学与地理关系上的“七巧板效应”。通过田野调查，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的少数民族史诗属于草原史诗、高原史诗、山地史诗，因而不同于古希腊的海洋城邦史诗、印度的热带雨林史诗。当然，注重田野调查并不是说可以忽视深厚精深的材料文献，研究中华文化需要以丰富的文献材料为支撑。

作为学者，我们研究中华文化、探究中华文化精神，切不可坐在书斋里，而要植根大地、连通地气。精致的瓷碟只能培育出绿豆芽，广阔的大地才能生长出参天大树。学术研究也是如此。为此，有必要提倡“五学法门”，即眼学、耳学、手学、脚学、心学。所谓“脚学”，就是要坚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注重田野调查，以双脚丈量写在大地上的中华文化血脉。就算研究中国传统文学，我们也要用好“脚学”，通过田野调查形成“文学地理学”。这种方接地气，可以形成文学与地理关系上的“七巧板效应”。通过田野调查，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的少数民族史诗属于草原史诗、高原史诗、山地史诗，因而不同于古希腊的海洋城邦史诗、印度的热带雨林史诗。当然，注重田野调查并不是说可以忽视深厚精深的材料文献，研究中华文化需要以丰富的文献材料为支撑。

作为学者，我们研究中华文化、探究中华文化精神，切不可坐在书斋里，而要植根大地、连通地气。精致的瓷碟只能培育出绿豆芽，广阔的大地才能生长出参天大树。学术研究也是如此。为此，有必要提倡“五学法门”，即眼学、耳学、手学、脚学、心学。所谓“脚学”，就是要坚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注重田野调查，以双脚丈量写在大地上的中华文化血脉。就算研究中国传统文学，我们也要用好“脚学”，通过田野调查形成“文学地理学”。这种方接地气，可以形成文学与地理关系上的“七巧板效应”。通过田野调查，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的少数民族史诗属于草原史诗、高原史诗、山地史诗，因而不同于古希腊的海洋城邦史诗、印度的热带雨林史诗。当然，注重田野调查并不是说可以忽视深厚精深的材料文献，研究中华文化需要以丰富的文献材料为支撑。



凡书皆有图

●依雁

有人认为现在已进入“读图时代”，书籍的彩色化、图片化成为出版的趋势。人们尝试在文字和图片间找到新的关系：它们是两个并行的信号系统，在“语言和文字的极限处让绘画和照片绽放光芒”。

其实，“古人以图书并称，凡书皆有图”。徐小蛮、王福康著的《中国古代插图史》(上海古籍出版社)追溯了中国古代书籍插图的悠久历史，让人了解到各个时代、各种形式、各种风格的书籍插图。

图书起源于简帛。在2000多年前的秦简《日书》上，就有一幅人形图，上面画着两个小人，另一幅是简单的方框图。竹简非常狭小，不适宜画图，所以在简上的插图不多见。帛上的插图非常多，最著名的就是楚国的《帛书图像》，它比秦简《日书》的年代更久远。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插图从手绘进化到印刷。插图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上至经史通鉴、治国要略，下至天文地理、百科常识，包罗万象，可以作为启蒙读物、教化图说、形象纪录，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是



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明清时期，西方科学文化传入中国。西方绘画的透视法、明暗法运用到了中国书籍的插图中，于是插图有了远近和光影。新的印刷插图技术虽然使传统的雕版插图走向衰亡，但也使铜版插图和石印插图继往开来，加快了文明

的脚步。图像“是历史中的人们绘制的，它必然蕴涵着某种有意识的选择、设计和构想”，其中就积累了历史和传统，古代书籍插图同样如此。

## 杜甫与刘禹锡的房子

●何青翰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在这首弥漫着黑色气息的诗歌里，杜甫流露出纯粹的悲伤，笔笔见血。这使得我们仿佛就站在他那破败的茅屋前，直接面对着他心中的痛苦、悲愤、忧郁。但是可以看到，就在全诗的最后，连一个能够避风避雨的居所都没有的诗人杜甫，居然关心起全天下的寒士来：只要他们得到安居，自己就是受寒冻死也是心满意足的。至此我们可以明白，杜甫的内心是痛苦的，他无法像隐士一样回避这样深重的痛苦；但是，他的痛苦又是深广的而不是偏(biàn)狭的，是公众的而不是私人的。在他为天下人而感叹的悲愤之中，饱含着生生不息的理想之火。只有从杜甫的这种个性出发，我们才能体会，杜甫是一个真正的“忠君爱国的诗人”，是一个真正的“关怀人民的诗人”。

与此对照，另一位唐代的诗人刘禹锡也写过自己的“破房子”，这不免让我们怀疑：是不是诗人都没有好的地方住？也许诗人就像是水手，一生都在追求彼岸的征途上。刘禹锡因参加了永贞革新，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革新失败后，他连续被贬，困苦挫折之中，他却写下

这篇超凡脱俗的《陋室铭》，并刻上石碑，立在门前，以表明高洁的志向：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刘禹锡笔法清雅流利，在区区八十一字内运用了对比、白描、隐喻、用典、借代等手法，气韵开朗而又掷地有声，使我们宛如身临其间，与这位潇洒傲岸的士大夫对弈、听琴、谈论人间正道。从全文来看，刘禹锡的心情是旷达而明朗的，他拒绝用哀怨、苦闷的诗句对自己的遭遇进行诅咒，而是从容依旧，把简陋的居室视作心灵的天地，充盈着斗士的快乐、欣然。这种快乐不同于轻浮的物质享受，刘禹锡之所以能在逆境中保持乐观心态，实际上是因为他和杜甫一样，有着超越个人得失的博大胸襟，有着高远的理想与志趣。

在这两位唐代伟大诗人的身上，我们应该学会的是：苦乐以天下。

一千多年风雨已逝，王宫一座又一座地坍塌了，但是“茅屋”和“陋室”却仍然长存在历史中，成为了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 我看我说

## 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杨义